

郭若愚 编

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



上海书店出版社

郭若愚 编

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郭若愚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
ISBN 7-80622-308-8

I．先… II．郭… III．古代货币—考古—中国—先秦时代 IV．K8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2016号

责任编辑 童辰翊

技术编辑 毛志明

装帧设计 晓 斐

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

*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邮编 200001)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7 彩插 4 页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 7-80622-308-8/K·32

定价：25.00 元

序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开创时期。也是中国货币从发生、发展到逐步形成独立的、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形制、风格和体系，呈现出灿烂的中华货币文化的时期。先秦货币包括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相继发展的三种形态。春秋战国时代，金属铸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品种多，发行量大，形成多元的区域性的布、刀、圜钱、青铜贝和楚金钣等系统，后来互相融合，趋于统一，出现了方孔圆形钱。这个方孔圆形钱的形制，继续保留了二千多年，直到本身消亡为止。因此，先秦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研究先秦货币，由于历史久远，文献资料欠缺等，存在着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近一个世纪，考古专家、钱币专家和历史学家，无论对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的探索研究，都作出很大的努力。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更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郭若愚先生新著《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就是十分可喜的研究成果。

理清先秦货币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金属铸币的产生和由多元化多样化向一元化规范化发展的历史原因，以及确定铸时铸地等，是很不容易的事。郭若愚先生的这本新著，根据多方面的论证，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论述，而且引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先秦铸币铸有的古文字，是探索和解开许多难题的重要依据。中国古老文字是现在汉字的原始状态，很难读懂，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即使从古文学上考证出铸币的铸地，还要进一步考证其古时和现在的地位以及铸造时间等，这又涉及到很多学科的很复杂的问

题。郭若愚先生在古文字的考证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解决了许多难于辨认的古文字的含义，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认识，识别了许多铸币的伪造品，解开了许多疑难的问题，对于研究先秦货币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阅读这本书稿，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始终是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也就是坚持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进行研究工作的。作者在论证中提出新的见解或结论，可以肯定的加以肯定，一时还不能肯定，也作出各种的推论，留有很大研究余地，启发人们继续探讨。这种学术研究中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谦虚谨慎的学风，同那种一知半解，强不知而为知，在缺乏任何根据下，随意作出主观臆断的不良作风是截然不同的。郭若愚先生在新著中体现出这种好的学风是极为重要的，是当前钱币与研究中所十分需要，而应该大大加以提倡的。我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而得到一定的启发。

马飞海

2000年4月

绪 论

先秦时期是我国原始制社会进化到奴隶制社会，又从奴隶制社会进化到封建制社会的一个漫长的经济基础急剧变化的复杂时期。先秦时期的货币有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三种形态，其发生发展以及源流迹象等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好在我国近年文物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对于先秦货币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科学的依据。同时，我国各地区钱币研究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这样就集中了群众对我国钱币研究的力量，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专家们研究，我国货币的产生，大约在五千年前的夏代，这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人们已经从氏族制发展而成立了国家，亦有了军队。这时的生产资料已出现了私有制，社会上开始有了物物交换的市场，在物物交换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种能与各类物品交换的等价物，这就是产生了实物货币。马克思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①商代以后，天然贝从装饰品渐渐成为实物货币，一时被人们大量使用。商代遗存的甲骨卜辞和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可以见到许多关于“用贝”和“赐贝”的记述。同时，商周时期的冶铜技术甚为发达，青铜制造的工具也普遍为人们所采用，这些青铜工具在使用中就渐渐定形，成为商品交换中的实物货币，天然贝亦就恢复成为人们的装饰品，而且出现了许多仿制贝。青铜工具还没有真正成为铸币以前的一种形态，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始布”，也有学者把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经过冶炼过的青铜块，称为称量货币。这些论点，很难使人信服。当然，这些情况都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发现，予以证实说明。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生产力渐渐解放，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商品交换频繁，货币经济也就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繁荣，这时金属铸币也就开始出现而被大量流通使用。从考古的迹象来看，春秋时期宗周地区首先使用铸币，有空首平肩弧足布及空首斜肩弧足布。稍后三晋地区亦行使了铸币，有空首耸肩尖足布等。战国时期韩、魏、赵三国铸行大小平首尖足布、三孔布、圆首圆肩圆足布、类圆足布、小方足布、桥足布、异形布等。其次是燕、齐铸行刀币、秦行圜钱，地处南方的楚使用蚁鼻钱及金版。这是由于各地区商业资本的兴起，交通发达，都市繁荣，需要货币。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时期的货币，根据其铸币的形式，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即布币区、刀币区、圜钱区和蚁鼻钱区。但到战国中期以后，铸币形式突然变化，布币区亦铸行刀币和圜钱，刀币区亦铸行布币和圜钱，蚁鼻钱区亦铸布币。这是商业繁荣后的需要，地区和地区之间，不得不改变原有的铸币形式，约定俗成，改为统一形式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到了战国晚期，整个铸币的形式都趋于圜钱，这是因为圜钱是最实用，最方便，最

适宜的货币形式。以后方孔圆钱的形式出现，使这些多种多样的铸币都成了这个形式。这个改变过程，战国晚期已经逐渐形成。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遂以行政命令规定了方孔圆钱的铸币形式。从此方孔圆钱在我国就一直使用到清代末期，整整使用了二千多年。

宗周地区的流通货币

宗周地区货币是一个铲工具的形式，这是在此地区的劳动人民大都从事农业耕耘的缘故。铲是农业生产工具，铜铲在这地区首先取得了实物货币的职能，以后发展成为铲形铸币。铲形铸币上端有銎，肩部平直，以后渐趋下斜，铲的刃部呈弧形，现在我们称为“空首布”。据统计目前已经发现的空首布有六千多枚，分大、中、小三个类型，早期可能大型的铸造较多，以后小型的铸造较多。大型空首布通高10厘米、宽5.9厘米，重30克左右（不连泥蕊）；中型空首布通高8.7厘米、宽4.5厘米，重20克左右；小型空首布通高8.0厘米、宽4.3厘米，重15克左右。其出土地点是环绕中州，即东周的王城地区。以洛阳为中心，北至孟津、新安、南至宜阳、伊川、临汝，东至偃师、登封等地。1970年12月洛阳伊川富留店村出土一瓮空首布计753枚，其中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有604枚；1974年8月，洛阳市西工十五厂出土两罐空首布计1883枚。尤其是伊川出土的空首布在瓮中首部向外，足部向内，圆旋形层层堆叠，排列有序，可见这些空首此后中州地区的流通货币，也就改用秦“半两”钱了。

1974年8月，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出土十八枚银质布币，大小长短不一，其中有两枚特长，圆柄，平肩平足，柄作圆锥状，有一枚柄未注满，呈空管状，通高10—14厘米，体长8.4—11.8厘米，宽5.8—6.4厘米，实柄的重162.7—206.4克；特长两枚通高13.7—15.7厘米，体长13.7—14.2厘米，宽5.8厘米，其中一件重188.1克。研究者以这些银币作为“空首布”进行研究，其铸造时间定在春秋中期到战国初期，还有研究者认为是东周时期楚国的货币。我的看法是：

一、中原地区从春秋中期开始使用空首布，已经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它们有统一的标准，如形制大小统一，铸币重量统一，质量统一等。扶沟银币形制大小不一，重量不一。虽然这些银币都有一个“把”，但和空首布的“銎”不一样。所以扶沟银币不具备流通铸币的职能。

二、扶沟银币其形制接近铲布，因此只能是晋的货币，不是楚的货币。楚金版是平版盖有印记，如果是楚的银币也应如此。银币出土地为扶沟古城村，是战国时期的

鄢陵，属楚。但鄢陵原是韩地，货币又是流动之物，尤其是银货币具有国际货币的职能，楚国同样可以流通或储藏。

三、扶沟银币大小不一，从实物上看，是同一时期的铸品。银币具有相当厚度，币面和币背之间呈斜坡状。如果和1982年江苏盱眙穆店公社南窑庄出土的两枚最大的“郢爰”金版比较，长方形，四周币面和币背之间都呈斜坡状，这是金银铸版的特有现象，于此可知扶沟银币是晋国通行的银质称量货币，以其银的重量多少作为支付手段，这是楚金版外又一种称量货币的实物，是我国货币史上的重大发现。我国唐宋以后使用的长条形的“版”、“铤”、“笏”等银货币，和扶沟银币是一脉相承的。

四、扶沟银币的“把”，我认为是铸银版时的一个流道，所以都是实的。有一枚是半空的，这是浇注时没有注足注满所致，不是“空首”现象。空首布的“釜”内都留有黄泥的“蕊”，扶沟银币是没有的。当然带有流道的铸品说明还是半成品，留待以后加工清除。但再想一想也觉得留着并不碍事，反正都可以称量计算的。

晋国和赵国的流通货币

晋国地域内最先铸造和使用的货币形式是空首耸肩尖足大布，和中州地区的平肩弧足空首布比较，釜细而长，币面有三道平行竖纹线，耸肩，足部两尖巨大而长，有圆裆和∏形裆两类，大都无文字。这类空首布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有阔型和狭型两种形式。大型布通高19.7—14.5厘米，重35.3—37.0克，绝大多数无文字，旧谱称“无文大布”。少数有记数字；中型布通高11.7—12.5厘米，重25.3—30.7克；小型布通高11.7厘米，重25.3克。这类空首布并不是平肩弧足空首布的派生，它是从晋国地区早先使用的一种青铜农具“耦”演变来的，它的出现较平肩弧足空首布要迟一些，春秋晚期晋国地区已经普遍使用这类空首布。1957—1958年山西侯马西北庄东周遗址发现一处春秋晚期空首布的铸造地，1959年又在侯马牛村东周遗址春秋晚期地层内发现十二枚中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和大量空首布釜的内范（泥蕊），其中有一枚空首布币面上有六个文字，模糊不清，最后两字似乎是“黄钁”，由此知道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名称也叫“钁”，和空首平肩弧足布相同。耸肩尖足空首布带文字的尚有“邯郸”、“吕”、“刺”等数种。1981年5月山西稷山吴城村出土“邯郸”空首耸肩尖足布一枚，通高14.0厘米，和侯马出土的形制相同，都是晋的通货。这类空首布，近年山西寿阳及河南安阳均有出土，安阳出土竟达数百枚，从而可知这类货币在当时是普遍流通的。

战国早期，三晋地区的货币进行了一次大改革，这时期赵国铸行一种平首耸肩尖足大布，显然这是从空首耸肩尖足大布衍变而来的。空首布铸造工艺繁琐，尤其是“釜”的制造，需要泥蕊填充等。平首布铸造就简便得多。这是适应当时市场需要更多的货币流通所致。平首耸肩尖足布有大小两种，大型布通高8.5厘米，宽4.3厘米，约重10—13克；小型布通高4.6—5.0厘米，宽2.4—2.8厘米，约重6.5—7.1克。币面文字大型布有“邯郸”、“榆次”、“易人”、“晋阳”、“兹氏”、“大阴”、“蔺”、“邪”等；小型布有“易人”、“大阴”、“邪”及“榆次半”、“晋阳半”、“兹氏半”、“蔺半”等。这时货币开始铸造两级制，用以适应商品市场交换的需要。这里大型布一枚抵小型布两枚，大型布为一钁，小型布为半钁。仍然以钁为货币单位。

战国早期中期赵国制造了一种“三孔布”，圆首圆肩圆足，首部及二足都有一个孔。据研究，三孔布上的地名能够考查的已有二十多个，都是赵国的地名^②这类二孔布是继承平首耸肩尖足布而来的。这两者继承的关系是：一、平肩耸肩尖足布有大小两级，三孔布也是大小两级。二、大型平首耸肩尖足布是一钁（实测11—12.5克），小型平首耸肩尖足布是半钁（实测6.0—6.5克）。大型三孔布重一两（实测13—15克），小型三孔布重十二朱（实测6.5—7.5克），两者重量相当接近。三、三孔布的制造，从耸肩变为圆肩，从尖足变为圆足，这是当时适应货币流通的需要，也是我国铸币向“圆形”发展的滥觞。

我认为铸币形式的变化，不能以自然界事物进化的纯粹客观的现象来解释，铸币形式

的改变除了本身衍化的成分之外，绝大部分存在人为的因素，这点是不能忽视的。三孔布的形制是当时依据平首耸肩尖足布的形式加以人为设计而成，至于三个孔的作用，现在是无法知道的，当然不必去随便猜测。

赵国铸造三孔布的时间并不长，只十来年。铸量不多，流传不广。在此之后，赵国又铸造了一些圆首圆肩圆足布，这些布和三孔布大小相同，形状亦相同，也是两级制。只是三个孔没有了，三孔布背面的“一两”和“十二朱”的字样也没有了，保留首部的炉次编号。这是铸造工艺上的一种省略，由繁趋向简化是势在必然的。圆首圆肩圆足布有大小两种，大型布通高7.4厘米，宽3.8厘米，重约9.6—10.2克；小型布通高5.1厘米，宽2.6厘米，重约6.4—7.0克。币面文字只见“离石”和“藺”两种。此外赵国还铸造一种“类圆足布”。这种布是在平首平肩尖足的基础上，其首、肩、足都是圆形，但不同于圆首圆肩圆足布，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形式。这类布币现在出土渐多，1963年山西原平县武彦村出土“晋阳”布一枚，1979年河北灵寿县出土“兹氏半”、“兹氏”、“兹”等数枚。这类布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著录“大阴”5枚，“邪半”2枚，“晋阳”5枚，“阳人”1枚，“平甸”1枚，很明显这类铸币是受了三孔布铸币趋向圆形的影响。这类货币当时似乎并未大量流通，赵国就铸造了大量平首平肩尖足小布，同时韩、魏铸造了大量平首平肩方足小布。赵国铸造的平首平肩尖足小布形制同半斩的平首耸肩尖足小布，已发现有地名的五十余种。圆首圆肩圆足的“离石”布此时改铸为平首平肩尖足小布。赵国还铸造过一些平首平肩方足小布，圆首圆肩圆足的“藺”布，这时也改铸为平首平肩方足小布。“藺”字小方足布到了战国晚期又改铸为“藺”字刀币，这是因为赵国的政治中心向东迁移，以邯郸为都邑，和燕境接壤，交通频繁，商业贸易发达。赵国铸造了“邯郸”、“白货”、“成白”、“藺”几种刀币以付流通需要。这类刀币今称“直首刀”，刀身挺直，圆首。“邯郸”刀币通高12.3—14.9厘米，宽1.1—1.6厘米，重10.2—13.0克；“白货”刀币通高13.4厘米，宽1.5厘米，重7.5克；“成白”刀币通高13.4—13.6厘米，宽1.4—1.6厘米，重15克左右；“藺”刀币通高11.0厘米，宽1.1厘米，重8.2克。1979年开始，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灵寿城址进行了勘查和发掘，证明了此地是为中山国后期的都城。并发现了大量“成白”刀币实物。1986年在灵寿城址西南角窖穴内发现“成白”刀币1501枚，这些刀币捆扎有序，麻绳的痕迹明显。“成白”刀币每捆为45—51枚，以50枚者为多。同时还发现了一件“成白”刀币的石范，因此、也就发现了一处“成白”刀币的铸造地点，这对于研究战国货币的国属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战国末期赵国又有“藺”和“离石”圜钱，这是赵国货币最后向圆形发展的表现，可是这类圜钱传世极少。可见其流通时间之短促，大约不久即秦灭六国，一律改用方孔圆形的“半两”钱了。

战国魏、韩的流通货币

战国中期魏在大梁铸造了一套货币，两级，平首、圆肩、平足、弧裆。这是魏国铸币的新形式。货币单位曰“尚(铢)”，大型的一种币文为“梁正尚(铢)百当孚”，重10.82—16.0克，以一百枚当一“孚”；小型的一种币文为“梁半尚(铢)二百当孚”，重7.03克，以二百枚当一“孚”。不久又改变形式，改“尚(铢)”为“斩”，平首，呈倒三角形，圆肩，平足，深弧裆，特厚重，两级一套。现称此类货币为“桥足布”。大型的一种币文为“梁新斩五

十当孚”，重17.4—29克，以五十枚一“孚”，小型的一种币文为“梁新斩百当孚”，重7.21—15.5克，以一百枚当一“孚”。这枚大型斩布币文“五十”旁有合文符“二”，过去研究者都认为是数目“二”字，长时期没有弄清其含义。笔者在1983年撰文予以解释。^③并指出这些货币所兑换的“孚”是指黄金的重量。现在扶沟古城村出土十八枚银版，可想而知银称量货币的出现，亦定然有金称量货币的存在。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并非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河南扶沟银币的出土，对我的论说，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魏都於安邑时也曾铸造过和梁布同样形式的两级货币，币文曰“安邑二斩”、“安邑一斩”，文字有正置和倒置两种，也有背阳文“安”及素背两种，有的背而还加“李”字的，这说明这类货币和梁布是同等使用的。“安邑一斩”币重14.8克左右，“安邑二斩”币重28—29克。如以安邑布和梁布的重量、形制变化，出土地点等结合币面文字，综合研究，可以发现战国时代各国货币的流通和兑换率，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魏以“桥足布”的形式铸造的货币尚有“音阳”布，三级。“音半斩”币和“音阳一斩”布为平首平肩；“音阳二斩”币为平首圆肩。“音阳”旧释“晋阳”，这字显然不是“晋”字，而是“音”字。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六十六枚编钟，大都有错金文字，其中音字作，和币文相同，可知币文应该是“音阳”。裘锡圭同志释为“圉阳”，谓其故址在今陕西省神木县东。^④我意魏铸此币时其政治中心已向东移，神木地处陕西东北部，早已是秦的势力范围。而且山西北部原是赵的辖地，魏似不可能在此铸币。据魏铸梁布、安邑布均在当时商业中心大城市，“音阳”必然也是商业城市之一。我初步认为“音阳”是为沁阳，音、沁同音可通假，是沁水流域下游的一个大城市。古时交通以水道为主要枢纽。《水经注》：“怀县北有沁阳城”，可见当时沁阳已是城市，今武陟之交有沁阳村，可能即其故址。“音阳”在战国晚期亦改铸为刀币，现今所见有“音阳新货”、“音阳货”、“音货”、“音半”等四种，均平首直身，其铸造时间，大概和直首刀“邯郸”、“白货”、“成白”等同时。时间极短，故流传是十分稀少的。

和“音阳”桥足布形式相同的铸币尚有：（一）“梁半斩”、“梁一斩”布，均平首平肩，“梁二斩”布，平首圆肩，三级。此币文字极难释，旧释“梁”，不可信。（二）“阴晋半斩”、“阴晋一斩”布，均平首平肩。按理应该有“阴晋二斩”布，尚待发现。《史记·魏世家》：“文侯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阴晋属魏地。（三）“甫反一斩”布，平首平肩，“安一斩”布，平首平肩，“文安半斩”布，平首平肩，“安二斩”布，平首圆肩等，我意均属三级制，其未见斩布，均有待发现之可能。平首圆肩弧足布尚有：（一）“安阴”布大小两种，大型布左足部有“二”字，小型布左足部有“一”字。（二）“虞一斩”和“虞半斩”布，两级。张颌同志新释为“陕一斩”，可以研究。（三）“安邑半斩”一种，其形制和“梁半尚（鏹）”布相似，这一类弧度较大的圆肩桥足布，其铸造年代应该早于圆肩桥足布。（四）“共半斩”布，这是“共”字圉钱的前身，其铸造年代都在桥足布流行之前。赵国尚有平首平肩弧足布“分布”币一种，首有小圆孔，形制独特，极少见。1947年间山西发现一窖，约四十余枚，大部流入上海，为上海钱币收藏家收得。“分”即汾，汾阳之布也。

与魏铸斩布类似而又奇特的有“卢氏全涅”及“全涅”两种布币，平首，首部顶端两侧有尖角，平肩，方足，字裆，一般高7.0厘米，重20克左右。“卢氏”春秋时为西虢邑，春秋晚期铸有“卢氏”空首斜肩弧足布一种，其地处河洛之间，战国中晚期属韩。“涅”为涅水，今名赵河，出河南镇平县北，南流会洪河，严陵河注于湍河。旧释“涅金”或释

“涅阴”我意“卢氏涅金”意谓“卢氏”与涅水两地合铸一币也，与“涅金”布形制相同者尚有“𠄎”布，平首有尖角，平肩、平足、尖裆，通高5.0厘米；“公”布，币面有“公”并其左右两竖线，背三竖线，平首有尖角，平肩、平足，尖裆，通高4.5厘米。此类布币今称“异形布”，是为韩的铸布。韩的铸币多小方足布，这类铸币当铸于战国晚期，和魏铸三级桥足布是同时的流通币。

魏在战国晚期亦铸行圜钱，今见有“垂垣一铎”、“垣”、“共屯赤金”、“共”、“襄阴”数种。这些圜钱的铸行年代，大约和赵铸行“蔺”、“离石”圜钱的同时。

“垂垣”旧释“长垣”，裘锡圭同志释“漆垣”，谓“漆垣当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上郡属县漆垣。汉代的上郡之地在战国时代本来分属魏、赵，后来逐渐为秦所占”。^⑤我意此字应释为“垂”。“垂垣一铎”圜钱的币文有两种形式，一种四字向右旋读，“垣”字作𠄎；又一种向右旋读而“垣”字作𠄎。我们称后者为“垣”字传形，这种传形圜钱已经发现多枚，都是如此，不是偶然现象。在传形“垣”字圜钱上“垂”字作𠄎。《说文》：“𠄎、𠄎木华叶垂。象形。”又：“𠄎、草木华也。从垂亏声。”按“华”、《石鼓》作𠄎、《朱公华钟》作𠄎、《克鼎》作𠄎、《命簋》𠄎、《华季盨》作𠄎，其所从之“垂”与圜钱之𠄎相似。再《王孙诰钟》差字作𠄎，其所从之“垂”字，与此更为相像。垂，春秋卫邑，战国属魏。《春秋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垂”。传作犬丘，《杜注》：“犬丘、垂也”。即今山东曹县此句阳店。

𠄎字圜钱旧释“共”。按“共”、春秋器《大孟姬尊》作𠄎，战国器《楚王禽肯簋》作𠄎，古玺文字有𠄎和𠄎两个类型。《说文》：“𠄎、同也，从廿、𠄎。𠄎古文共”。圜钱𠄎字廿之横划两端下垂而又向两边分开。与“共”之形体不合，可见不是共字。我意𠄎上之𠄎为冪。《说文》：“冪、覆也，从一下垂也”。又：“冪、小儿蛮夷头衣也。从冪、二其饰也”。这两字都指“头衣”，就是现在的帽子。又《说文》：“冪、覆也、从冪、上下覆之”。也是指帽子。《说文》：“𠄎、冕也，周曰冕，殷曰𠄎、夏曰𠄎，从𠄎象形。(皮变切)𠄎、籀文𠄎，从𠄎上象形，𠄎或𠄎字。”圜钱此字上部像帽——冕，应为𠄎字，𠄎字古文也。此字可省作𠄎，今写作弁、或下。音皮变切。

𠄎字圜钱指魏的卞地。《汉书·地理志》称卞水，《后汉书》称汴渠。隋以前汴水在河南荥阳县，北受黄河之水，即古荥渚。圜钱之卞即指古荥渚地，因其地临汴而得名也。其地近魏都大梁，水路交通发达，人口稠密，经济贸易繁荣，为魏后期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於此也可以想象，此圜钱是继梁布之后而铸造的流通货币。是魏由圜布改变为圆形货币的具体表现之一。此时其他各国的大城市亦都纷纷铸造圜钱。可是为时不久，这些圜钱被秦“半两”方孔圆钱替代了。

燕、齐的流通货币

燕国地处河北省北部，内蒙古南部及辽宁省西南部，燕都即今北京市西北地，当时称蓟。战国时燕昭王修建“燕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武阳。因此蓟称“上都”。燕于战国中期铸行刀形货币，今见有“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字刀三大类。其来源是模仿当地人民随身佩带的刀削。草原人民以放牧为经济来源，生活以肉食为主，刀削是每人肉食必备用具。当时刀削以青铜铸造，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渐渐形成实物货币，之后，铸币就模

仿刀削，成为刀币。研究者认为“明”字刀是根据尖首刀发展而来，尖首刀又是根据针首刀发展而来。我意这三类刀币，并无递变关系，只是铸造时间略有先后，铸造地区有所不同，因此形状有异。但“明”字刀因其铸行及流通时间较长，传世数量极多。据统计目前出土的“明”刀数字以“顿”来计。现在研究者大都分“明”刀为三期，三个类型。(一) 体形较大，通高13.5—15厘米，重17.8—19.5克。刀尖平钝，弧背，刀身与刀柄连接处成圆弧形，柄上面背均有二道直纹。面文作, 背文为干支字或数目字。(二) 体形较一型略小，通高12.8—15厘米，重14—19克，刀身与刀柄连接处成圆折，柄上面背均有二道直纹，连同柄之两边成四道平行线。面文作, 背文有“左□”或“右□”。(三) 体形略小于二型，通高12.4—14.3厘米，重12—18克，刀尖平直，刀身与刀柄连接处成方折，柄上面背均有四道平行线直穿刀面而至刀背线。面文作, 似目状。背文除“左□”、“右□”外，更有“𠂔□”及“外𠂔”等文字。

“明”刀的“明”，近来研究者大都倾向于“𠂔”字说。按“𠂔”《郾王职戈》作, 《侯马盟书》作, 《中山王壶》作, 古玺文作。可证此字非“𠂔”甚明。同时，有研究者又把“𠂔”字亦释为“𠂔”。试想、在同一件刀币上，其面文为“”，背文为“𠂔”而同时出现这两个不同形体的“𠂔”字，在古器物研究领域里还未见过。因此，“𠂔”字之说是说不通的。我认为此字可释作“邑”。《齐侯壶》作, 《师酉簋》作, 《矢簋》作。刀币上的“邑”字，将之左下，这种形体在铜器铭文中亦有所见。《𠂔羌钟》：“令于晋公，邵于天子”，邵字作, 其邑旁作, 与刀币之字相同。《说文》：“𠂔、国也，从。”《书·汤誓》：“率割夏邑”。均指首都，也就是指国家。甲骨文辞中商人自称商为“大邑商”，就是这个道理。燕铸币以“邑”指燕，是可以理解的。再，“邑”音於汲切，“燕”音於甸切，双声可以通假，故称“邑”也就是称“燕”。

战国晚期燕国也铸造布币，其中有“右‘明’新冶”布一种。如果这四字释为“右邑新冶”，意谓此币乃“右邑”新铸之物，则辞通意明。於此我们可以联想：有“右邑”则必有“左邑”。“明”刀背文之“左□”、“右□”可能指的就是和“左邑”、“右邑”有关之物，这里省简为“左”和“右”了。“明”刀背文的“左”、“右”，同样说明了此刀的铸造地点是“左邑”或“右邑”。燕有上、下两都，上都薊即现今北京地区，据报道：自1953年至1983年已出土战国燕币41批，其中绝大多数为窖藏，少数为居住遗址残存，个别为墓葬出土。燕币中以方折刀为最多，其次为圆背刀，窖藏中则以圆背刀与方折刀同出较为普遍。尖首刀出土较少。^⑥燕下都出土的“明”刀据报道：近年来燕下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字刀化，这些刀都是社员在生产劳动中发现的，少则一至数枚，多则数千枚乃至上万枚。燕下都遗址截止目前，共出土字刀化二十五起，字刀化和布化共出的五起，总计刀化共出土33315枚。燕下都遗址内的郎井庄村东、郎井庄村北的第10号遗址和高阳村东还出了燕国字刀化的泥范或陶范。^⑦於此可知“上都”和“下都”即是燕国的两处铸造货币的集中地点。当然“右邑”是否指“上都”，“左邑”是否指“下都”，这问题还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证实。

燕国晚期铸行的布币，除“右邑新冶”布外，更有“益昌”、“平阴”、“襄平”、“安阳”、“𠂔货”等布，形制为平首（呈倒三角形），耸肩、束腰、平足而长。“安阳”布背文有“左十”、“右十”等文字，但早期铸的“安阳”布无此等文字^⑧，和“明”字刀背文相同。这大概同样是指“左邑”或“右邑”。“益昌”布铅制者，“平阴”布有特小者，通高3.3厘

米，重2.7克，但很少见。

最后，燕国也铸造方孔圆钱，现见有两种：（一）“邑货”圆钱，径2.5厘米，重3.2克。（二）“一货”圆钱，径20厘米，重2.2克。“一货”钱的重量和特小“平阴”布相近，其制造的时间是可以衔接的。

齐国铸有大型刀币，现在见到的有六种：

1. “齐建邦氓法货”刀
2. “齐之法货”刀
3. “齐法货”刀
4. “即墨之法货”刀
5. “即墨法货”刀
6. “安阳之法货”刀

这些刀币现称“齐刀”，铸造工艺精美，文字秀丽，通高18.5厘米左右，重47克左右。“即墨之法货”刀特重，达60克左右。据考古方面的资料，齐刀的泥范、石范等发现，但也有铜母范传世。据朱话同志介绍：“传世的齐法化铜范母其形制是四周有低缘，略似长形铜盘状。内有阳文齐法化刀形两枚，一面一背，彼此相背。两钱之中间有一凸出圆柱，与范缘相齐，由柱分出四枝，左右各二，通向刀面刀背，较柱稍低，左有三钉形，右有三窍，范母正中有一直线通上下，将范中分为左右两方。范长约20.5厘米、宽约10.8厘米、缘厚约2.6厘米，形长方而杀角，背略欹。范母不能直接铸币，专供翻制子范。”^⑨这里很清楚说明“齐法化”刀币已经使用先进的叠铸工艺技术，这是冶铸工人们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的创造，是用于大量铸造金属工具、农具和钱币的冶铸方法，这方法盛行于汉代。由此也知道齐国铸造刀币已经使用叠铸工艺技术，其产量之丰富，制品之精工是可想而知的，但其铸造的时间必然比较其他国家要晚。

我根据各方面情况推测，齐国在战国中期和燕进行经济贸易，其所通用的是燕币。到了战国晚期，齐仿燕刀币形式铸造刀形“大钱”即“齐法化”、“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等币。这些刀币的背面，都有“三十”两字。这个“三”字好似刀币上的一种纹饰，往往不为大家注意。我认为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战国文字“三十”有作的，这是三十合文，作“三十”是正规的。这说明一枚齐刀币兑换三十枚燕刀币。齐“即墨”刀也铸有许多小型的，其背文就没有“三十”字样了。这是很好说明了“三十”文字的作用。

齐铸大型刀币以一枚兑换三十枚燕刀币，这使燕刀币的持有者吃亏不少。但燕刀币持有者亦有对策，他们把燕刀币的头部截去，减少燕刀币的含铜量，拿来和齐刀交换。1975年山东临淄齐故城西、东石桥村出土一批尖首刀，头部都已截去，有八十枚。在此以前，招远、即墨、寿光等地也有少量或零星的截头刀币发现。朱话同志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在不老实的所有者手中，受到外科手术。”我认为这些燕刀所以要“受外科手术”，就是因为要和大额齐刀交易。

与大型齐刀形式相同的尚有“簠邦”刀币。1930年山东章邱出土残品一枚，存上半段“簠邦”两字。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谓：“簠、鄆古通谭，……按谭，见庄七年，杜注：谭国，子爵，为齐桓所灭。今在山东历城县东南七十里”。这枚残刀头现经研究是一件伪品，其“簠”字是杜撰的。^⑩清嘉庆年间，山东博山香峪村出土一批圆折“明”

刀型刀币，币面有字，背有“簠”字，今称“博山刀”，这是“簠”地完全仿燕“明”刀所铸造的货币，其兑换率是一比一。近年来研究者释为“莒”，通“莒”。这是对的。《说文》卢：“饭器也。从皿、声。籀文卢(洛乎切)”。《说文》有胪：“皮也，从肉卢声。(力居切)𩇛、籀文胪”。《说文》又有簠：“积竹矛戟矜也，从竹卢声(洛乎切)。”故知此字从竹、从胪，省作簠。传世金文见《申鼎》、《鄫平钟》。又簠(力居切)和吕(力举切)同音，故簠又可通作莒。莒为邑名，加邑作鄫。见《鄫侯簠》。莒刀的制造，有人认为是燕攻齐时在莒邑围城时所铸。认为围城时的莒邑为了和周围地区进行贸易，铸造和燕易刀相同形制的货币，也是必要的。这就很难想象，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79年燕攻莒邑，处在生死搏斗中的莒邑还能铸造货币和周围地区进行贸易！莒刀就我所见，大都文字不清，而且极多是伪刻的。对于“博山刀”的文字研究，还必需等待更多的资料出现。

齐国在战国晚期亦铸方孔圆钱，今见有“𧇔货”，径2.0厘米，重1.4克；“𧇔四货”，径3.5厘米，重5.3克；“𧇔六化”，径3.5厘米，重7.4克，共三级。但不久亦为方孔圆钱“半两”钱所代替。

楚国的流通货币

楚国地处南方，物产丰富，地域广大，商业十分繁荣。楚国的流通货币已广泛使用黄金，学者们以为楚是当时首先使用黄金货币的国家。楚使用的黄金是称量货币，没有固定形式，现称金版。每版上盖有印记，现见有“郢爱”、“陈爱”、“专爱”、“𧇔爱”、“鄢爱”、“卢金”等六种。其发现地点有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咸阳、西安等地。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黄金币392块，银铲形币18件，其中金版有192块，钤印记有“郢爱”170块，“陈爱”17块，“鄢爱”1块。“鄢爱”是首次发现。1982年2月，江苏盱眙县穆店公社南窑庄出土黄金铸币11000余克，其中有11块“郢爱”，有两块是长方形，一块重610克，另一块重466.3克，这是至今发现的最大的两块金版。黄金版上的“爱”字，有研究者主张释“𧇔”，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爱”到底有多少重量？这问题还没有结论。对于战国金银的使用及其在货币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似乎刚刚开始研究。我愿有更多的资料发现，以利解决这些问题。

货币天然金银，战国时期楚国使用的黄金还不能完全代替铜铸币，楚国的铜铸币现在发现的是大量“蚁鼻钱”，币面上有、君、金、行等十几种文字，尤其是字币最多。1963年湖北孝感县出土4745枚，1972年山东曲阜董大城村出土15978枚，1978年安徽宿县固镇出土3856枚，这是几处比较著名的币出土地点。蚁鼻钱的出土地点分布情况是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苏、陕西等地。有学者称蚁鼻钱为“铜贝”，我认为铜贝是摹仿真贝而制的一种仿制贝，形状并不完全像贝。现今考古所见仿制贝有金、银、骨、角、蚌、石料、漆及铜等各种质料，铜制贝还有鎏金的，这些似乎不是货币，而是装饰品，供人佩带。为了避免和蚁鼻钱混淆，我认为应该将两种东西区别开来。洪遵《泉志》称“此钱上狭下广，背平而凸，有文如刻镂，不类字，世谓之蚁鼻钱。”这是蚁鼻钱的最早命名。1974年武汉市文物商店从废铜中拣选到一件字币的残铜范，长7.0厘米，宽5.4厘米，厚0.3厘米。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冶炼厂废铜中亦拣选出两枚蚁鼻钱铜范，一枚完整，

一枚残缺。完整的一件长30、宽10.5、厚0.8厘米，重2204克。长条形，中间有两条注槽，范面有蚁鼻钱四行，分两行相对排列在注槽两侧，计币77枚。经目验此范为铜制对合范，可以直接浇注货币。这种工艺已较泥范、石范进步，其铸造时间自然较晚。据报导尚有蚁鼻钱的铜范母发现，1982年安徽繁昌县文物组在横山公社回收的旧铜中发现此物，但因报导不清，还不能令人置信。据此，蚁鼻钱的流通时间应该是战国的中晚期。

楚北鄙地区，和三晋地区接壤，尤其是和韩、魏经济贸易频繁。楚国铸造了一种铢布，通高10厘米左右，重34—38克，面文“殊布当铢”，背文“十货”。另一种小型铢布，为两铢相连形，因称“连布”，通高8厘米，重7.5克左右，面背文“四布当铢”。这两种楚铢布文字的释义已有多种。我查看《古玺汇编》第485页单字玺第19，第5362号有“𠄎”字玺，此玺文字和铢布第一字比较，知道铢布第一字是此字的反转体。我认为应该以玺文为准。楚铢布第一字可释为“杜”，地名，今河南商丘县东南有“杜集”，地居南岔北岔二沙河中间，即其地。1984年5月，河南永城县北鱼山的东南山脚下发现楚铢布六十余枚，五十年代此地曾出土楚铢布四枚。永城在战国时属宋，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即转为齐地。永城距商丘甚近，此铢布为杜地铸品是可信的。楚铢布第二字作𠄎，查《汗简》有𠄎字，释“比”，和铢文比较，铢文是反转体，当以《汗简》为准。“比”即“币”，同音通假。因此楚铢布四字可释为“杜币当铢”，“当”为“代”的意思。《国策·齐策》：“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谓杜地铸造的货币以和铢布兑换。显然这是一种和韩、魏铢布通用地区贸易的专用货币。此楚铢布第一第二字都是反转体，这可能是专为适应楚铢布右侧狭长而下端又缺的这么一个地位而设计的。古文字在古代正反两体常常通用，甲骨卜辞中最为常见，这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小型的一种楚铢布，面文为“四布当铢”。我意“四”字应该是“贝”字，是“货”字的省文。此布四字为“货布当铢”。大型楚铢布背文有“十货”两字，研究者认为是指十枚蚁鼻钱，即一个大型楚铢布可兑换十个铢字蚁鼻钱。我意蚁鼻钱重量的差异很大，从0.6克至3.6克，一枚大型楚铢布重37克，在一般情况下，十枚蚁鼻钱的重量抵不上一枚大型楚铢布。铸当十枚蚁鼻钱“大钱”的目的，就是要十枚蚁鼻钱超越大钱的重量，这样才有利可图，否则是不必铸造“大钱”的。我意“十货”是指十枚“货币当铢”布，即是一枚大型楚铢布可以换十枚小型楚铢布，是两级制。1985年河南新郑铸钱遗址出土了三个大型楚铢布和一个小型楚铢布的陶范，可见它们是一套货币，应该有它们的兑换率。

蚁鼻钱上的𠄎字，说法也很多，我同意清代吴大澂的说法释为“贝”，我意这是“货”字的省文。战国“货”字在铸币上省作“化”，再省作“𠄎”，或省作“贝”，音货。楚国铸“货”有专管机构。《古玺汇编》官玺161有“铸货客玺”，上海博物馆藏印41427有“右铸货玺”，于此可知楚铸货设有“铸货客”及“右铸货”等职官，大概“铸货客”是主要负责者。楚国尚见有“群粟客玺”^①及“郢粟客玺”^②知楚对粮食管理亦有专职机构，各地区设有“粟客”。这里，对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曾出土的楚王“铸客”铜器群，器上铭文中的“铸客”的含义，亦有了明确的了解，是为铸造这批青铜器的主持职官。

秦国的流通货币

秦国传世铸币常见的有三种，一是圉钱，一般径3.6—3.7厘米，重13.1—15.6克。币

文有“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三”、“一珠重一两、十四”三种。珠从玉，乃是由玉璧演化而来。联想到战国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可见秦国对玉器的重视。“一珠重一两”钱后面的三个连续数字可能是指秦的年号。《史记》记载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是否就是指这类钱，有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这个问题。“一珠”圜钱发现甚少，说明其铸量并不多，流通时间极短。二是“两甬”圆钱，方孔。径3.0厘米，重7.9克。《说文》：“甬、六铢也”。两甬即是十二铢，就是半两。这钱和“一珠”圜钱没有连带关系，因“一珠”钱是圆孔，此是方孔。“两甬”钱和“半两”钱关连甚大。我根据出土的秦“半两”钱观察，秦代后半期“半两”钱普遍减重，轻重大小不一，而“两甬”钱大小轻在却无甚差异。而其形制风格与陕西临潼秦始皇临葬坑出土之“半两”钱极为近似。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秦末钱币轻量悬殊，官铸私造混淆不清，经济十分混乱，秦始皇在此经济濒危之际，可能施行币制改革，铸行“两甬”钱替代“半两”钱。由于秦王朝急速覆灭，币制变革也就如昙花一现，只有少量“两甬”钱流传后世而已。^⑬ 三是“半两”圆钱，方孔。一般径3.5厘米左右，重7—8克。“半两”钱过去研究者都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所铸行的钱币，但近年来在秦故都雍城城郊、咸阳城郊、朝邑、耀县、四川青川、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的古墓葬，以及咸阳遗址、始皇陵园等地出土了许多“半两”钱，其中凤翔高庄秦墓、咸阳黄家沟战国墓、四川青川战国墓、巴县冬笋坝船棺葬、郫县战国墓等的年代，其下限都不晚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可见“半两”钱的普遍使用并不是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再秦“半两”钱铸量多，屡有出土，其通用时间之长，流通领域之广，亦是可以想见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秦王朝彻底灭亡仅十六个年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此期间不可能铸行如此大量的铸币。故对“半两”钱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现今许多专家就“半两”钱研究正全力以赴，估计不久即有重大的成果，这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注 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106—107页。

② 详见拙文《三孔布币面文字再考释及其铸造年代之探究》刊《中国钱币》1994.2期。

③ 拙文《战国梁布文字析义及有关问题初论》刊《中国钱币》1983.3。

④⑤ 见《战国货币考》刊《北京大学学报》1978.2。

⑥ 参见高桂云、张先得《北京市出土战国燕币简述》刊《中国钱币论文集》1985年北京中国钱币学会编。

⑦ 参见石永士、王素芳《试论“㒺”字刀的几个问题》刊《中国钱币论文集》1985年北京中国钱币学会编。

⑧ 见拙文《燕国早期安阳布》刊《中州钱币》《金融理论与实践》“钱币专辑”(二)1988年8月。

⑨ 见朱话《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⑩ 见拙文《论我国古代铸币的作假技术和辨伪方法》刊《钱钞辨伪》1993年上海市钱币学会编。

⑪ 见《古玺汇编》官玺160。

⑫ 见《古玺汇编》补遗二·5549。

⑬ 参见拙文《秦“半两”和“两甬”钱的时代和特征》刊《苏州钱币》1989年第5期。苏州钱币研究会编。《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群刊撷萃”摘录。

目 次

序	马飞海
绪论	1
一、“东周”和“西周”圆钱	1
二、空首布“八”为战国地名考	3
三、战国魏币文字三种考释	5
(一)“音阳一斩”桥足布	5
(二)“垂垣一斩”圆钱	5
(三)“卞”字圆钱	6
四、战国魏布文字考释三则	8
(一)魏𠂔斩布	8
(二)魏𠂔斩布	10
(三)魏𠂔斩布	12
五、战国梁布文字析义及有关问题初论	14
六、“阴晋”斩布	21
七、《铁云藏货》拾遗	23
八、三孔布币面文字再考释及其铸造年代之探究	25
九、方足布“郟”字币背文“一𠂔”释义	43
十、“蒙阳”小方足布	45
十一、“离石”圆足布背“五十”	46
十二、释战国韩布“卢氏涅金”和周布“𠂔川斩”	47
十三、齐法货刀币背“吉”	51
十四、识𠂔	53
十五、燕小弧背尖首“吉”字刀	56
十六、燕国早期“安阳”布	58
十七、燕币“邑”刀	61